

浙江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十一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十一輯

(国 内 发 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2年6月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96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5 字数165,000

1982年6月第一版

1982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700

统一书号：11103·63

定 价： 0.68 元

目 录

辛亥革命时期建德的一次会党起义	戴不凡 (1)
西湖博览会纪事	张任天 (9)
忆潘天寿	冯蔼然 (24)
记蒋百里二三事	蒋授谦 (32)
沈定一其人	陈功懋 (36)
我所知道的许绍棣	房宇园 (48)
回忆吴兴县“清党”前后	温永之 (69)
我在松阳起义前后	祝更生 (77)
我在浙南平阳起义的回忆	洪 彪 (87)
对洪彪《我在浙南平阳起义的回忆》一文的 补充意见	郑海啸 苏 松 (96)
国民党统治时期浙江省的历任县长	茹管廷 (102)
国民党统治时期浙江省民政厅见闻	茹管廷 (117)
《中国儿童时报》记略	田锡安 何紫垣 (132)
忆抗战时期创刊的《宁波日报》	郑正民等 (142)
记大港头“浙江省铁工厂”	胡四兴 马英才 (153)
义乌的“敲糖帮”	胡 琦 (161)
我推销“洋油”十年	陆柳亭 (177)
国民党的所谓“军民合作站”	何永德 (179)
记浙闽海匪	陈于滨 苏宰衡 (186)

杭州沦陷八年小记	钟毓龙 (192)
杭州沦陷时期群丑录	陈鼎文 (199)
浙江省裁厘经过和厘金局内幕	陈善颐 (219)
来函更正	(235)

辛亥革命时期建德的一次会党起义

戴不凡

辛亥革命前夕，建德有过一次会党起义，规模不大，时间很短，加上历时既久（大约在一九一〇年左右），知道的人就不太多了。

起义领导人徐汝根，马目源奇龙山脚人。他身材不高，体格壮实，剃和尚头，留八字须，眼象桂圆，炯炯有光，面孔有点象猫。

原先，我只从先父口中知道他在辛亥年因聚众抗粮在马目造过反，一两天就失败了，逃走后又被抓进城来坐班房；幸亏武昌起义成功，否则会被清朝“大辟”（杀头）。我家迁住横坑以后，我问一些老一辈的人，没有得到更多内容，只有一个跟他造过反的人名叫“老羊头”的说过：“汝根百屁（这是人们给他取的绰号）说两天打进城，后来不到两天就被官兵打败了。”后来，我到徐汝根家作客，他才滔滔不绝地谈起当年造反的经过来。以下是徐汝根谈的话：

“事情是远在光绪丙午（一九〇六年），马目源向来就有从东阳、义乌、金华一带翻山过来的手艺人，还有一大批赌博鬼。那时横坑有个油坊，打油工也都是金华那边来的，有个名叫老毛头的打油老把作，年纪五十出头，家在金华靠义乌附近，每年大

部份时间在横坑。这年冬天他回家前，说是要娶媳妇，希望我帮忙凑个会（按“会”原是浙东民间在经济上互相帮助的储蓄形式），我帮他凑合了十二个人的小会，每份大约合半担谷，参加的多是种田的和长年工。开春后，老毛头从金华回横坑，大家知道他在手艺人中和一批赌博鬼中又凑了两脚会，怕他在五六月间拿不出小会的这份会钱，我去问他，他说这点钱不在乎。我觉得奇怪，问他是不是春节回家赌博赢了钱，发了什么横财？起初他不说，后来他偷偷告诉我，他这次回金华，在自己村里又凑了一个会，每脚（份）是三十块龙洋（银元），他还不要坐头会，我大吃一惊，问他这么多钱是哪里来的？毛头师傅说：金华那边有个很有名的人，大约是赌博鬼出身，赢了大笔钱以后就洗手了，他专门喜欢凑会，没钱凑会的，只要向他去借，没有不答应的，而且还不收利息，我这次回家，就向他的徒弟一次借了贰百块龙洋。这人头发有点金黄色，大家叫他‘黄毛’，名字就叫‘黄金发’（当时在金华农村里就暗暗流传着有关光复会王金发的传说）。后来，毛头师傅暗中又告诉我：‘黄金发是黄龙投胎的，将来要做真命天子，他散钱给穷人凑会，就是为了招兵买马，准备造朝廷的反。’当时，我家因打败官司，一肚皮怨气无处可出，就要求毛头师傅带我去见黄金发，我也要参加造反。毛头师傅说：‘要见黄金发本人很难，但只要我们这里联络很多人，将来总有机会见到他。’他又说：‘我在马目又凑了两个会，其实，我早已为黄金发做联络人了。因为我是外路人，明年还要请你出面凑会。有了会，大家容易齐心。’毛头师傅还希望我让小会的人分头去联络更多的穷人，特别是山棚佬，不一定要凑钱摇会，大家结拜‘兄弟会’也可以。反正大家都是会里的兄弟。

“丁未（一九〇七年）端午节后，正是油坊打菜油的大忙时节，毛头师傅接到口信，突然回金华去了，对人家说是因老婆病重回家。临走前的晚上，到我家和我谈了半夜的话，他说：事情恐怕快要来了，他把马目会里的事全部交托给我，并说：如果他一时不回马目，将来怎样做法，会派人带口信给我。可是这一别，毛头师傅从此不来，而且音讯毫无。一直等到这年初冬，才从一个挑‘鸡毛换糖’担子的东阳人口中，知道毛头师傅于五月下半月在金华被抓去杀了头。‘黄毛’也不知逃避何方去了（按：王金发原和秋瑾约定这年五月二十六日在金华一带起义。但五月二十三、四日‘会党案’发，致未成功。可能徐汝根和毛头师傅一直不知道王金发和秋瑾的关系）。在会的人知道事情不妙了，心里都很闷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以后几年也没有什么动静，大家仍旧各做各的生计。

“辛亥前一年，春天多雨，夏收不到二三成，县衙门逼夏收钱粮逼得很紧，横坑进去几个村，公推我为首，向衙门递送‘禀帖’要求蠲免附加税和缓征正税，我进衙门，就挨了知县二十板屁股，说我是‘不法刁徒’，想想实在气人，但也没有法子。夏天又旱，收成只五六成，大家都愁交不起钱粮。那时钱粮正税每亩不过一二钱银子，但有各种带征银两，省里有附加，县里更有许多附加，正税连同各种花样的附加，一亩总共要交一担几斗米，收成不好的田，慢说钱粮，连稻种也收不回来。

七月半后的一天晚上，忽然有个背卖东阳布的来找我，说是从兰溪马涧翻岭过来的，原是金华人，姓章，和老毛头是好朋友，从他的谈话中，他确实和老毛头十分熟悉，而且他也知道马目会里的事，如人数、一些人的姓名等等，问他‘黄毛’的下

落，他说也不知道。但告诉我‘黄毛’原先的‘军师’（他不肯说出姓名）现在兰溪马涧，这次是‘军师’派他来和我联络的，说‘军师’重新联络各路人马，要学朱（元璋）皇帝杀‘鞑子’，‘恢复中华’。要我备好兵器，等待通知动手。还说除了会里的人以外，还要联络交不起钱粮的人。他和我谈了整个上半夜，第二天一清早就翻新岭走了。——这是一个瘦瘦的中年人，要我以后叫他‘卖布佬’。

“到了八月初头上，又有一个后生在夜里来我家，说是‘卖布佬’叫他来通知的，‘军师’决定在八月十五杀‘鞑子’，要我赶紧准备好攻城，交给我一块黄色松江布，说是用来做黄旗，将来会里的人胸前都要挂黄布条，以此为号。这个后生也是打扮成卖布的，没有留下姓名，第二天天不亮就匆忙翻岭走了。

“我和几个头儿商量，觉得真要造反攻城，可不那么容易。城里协台（按：绿营兵的副将）衙门有五六百兵，我们人数不及他们，手里又没有兵器。后来大家都说：只要传出‘不交皇粮’，就会有许多人跟我们，中秋晚上官府一定饮酒赏月，官兵也得到犒赏，我们在晚饭后动身，半夜杀进城去，准保成功。不料八月十二日县衙门来了两个讨钱粮的差役，在余家（村名）打了人，要把人带进城去，犯了众怒，打了差役。这一来事情闹大了，第二天，县里果然派了十来个兵，背着两根‘洋炮’（老式步枪）来抓人，抓去了打差役的农民，还抓去了两个会里的兄弟，他们朝天开了几下空枪，耀武扬威地把人带走了。

“会里的兄弟被抓，会不会供出真情？心里有点担忧，当天晚上我和几个头儿计议，认为等不到中秋，也等不得马涧的通知了，决定在十四日就动手，先发制人。第二天中午时，大家在横

坑庙里聚集，焚香点烛拜菩萨后，掬出黄旗，每人胸前挂上黄布条，正式造反，宣布不交皇粮。当时我的失策是，已经派人封了路，又估计城里要过中秋，因此似等马涧方面的来人，想在中秋晚上攻城，所以竖起黄旗造反，又犹豫不决地采取守势。我们一共有三四百人，除原来三个会里的人以外，多半是附近种山的山棚佬和打零工、做长年以及交不起钱粮的农民，也有赌博鬼。住在村上境遇稍好又有家眷的参加的不多，但都是支持我们的。我决定分兵三线，把主要力量近二百人放在马目埠头，我自己带了百把人驻在和村庙里，作为接应。还有几十个人分别留在横坑、余家。

“我的第二个失策是，把埠头的队伍布置错了。我们没有一根洋炮，只有二、三十根打猎的枪，还有十几把大刀和一些自制弓箭，以及‘柴冲’、扁担和削尖的毛竹枪，此外，主要就是靠四尊松树炮。我估计官兵未必会在明天赶来，即使赶来，无论从水路或大路，必定在埠头大码头上停船，于是我把三尊松树炮都集中放在大码头西边山神庙前，这里居高临下，官兵一停船，我们三炮齐发，冲下山来，同时埠头的人赶出夹攻，定可获得全胜。我只派二、三十人带一尊松树炮，埋伏在皇山庵边山上，监视小码头。我想，官兵爱走大路，不大会在小码头过渡，如果从水路来，在小码头上岸，就用松树炮先打他个下马威，驻埠头的人先赶去支援，再调山神庙的人也去支援，这也来得及。再如果官兵从施家埠或钟潭岭过渡抄小路来，那就由皇山庵和埠头的队伍两路夹住他。

“不料官兵竟在十四日半夜出动，更未料到他们分两路而来，协台自己坐着船又带领两船洋炮兵从水路来，另一路抄小路

来的也有洋炮，主要是大刀兵，总共有二三百人，他们约定东方发白时在皇山庵边会兵。我们的人没有打仗经验，头一日闹了一日，夜里又未睡，天亮边都打瞌睡了，及至发现官兵在小码头停船上岸，急忙去点松树炮时，火药线又被露水打湿了，点不着，大家心一慌，乱了阵脚，四散逃走。埠头的人赶去，被炮火逼回来，人也就逃散了。后来才知道，官兵在皇山庵一带先打死了我们两个人。守在这里的，有个打油工带着一‘伍’（五名）人，很齐心。他们打算靠高山这边翻过山去向源里撤退，被上岸的官兵炮火逼住，只得向朱家那边走。朱家岭上去有小村，村里有造纸槽，那里有我们的人。不料在朱家附近又被小路来的官兵包围。六个人只有两根猎枪，四把大刀，绿营兵有十多个人，也都是拿大刀的；我们的人少，又没学过刀法，打了半天，四个人都被杀了。两根猎枪在旁助战，打死打伤了三个绿营兵。后来因为枪筒发烫，打不出子弹，一个被抓，当场杀了头；另一个就是打油工，他站在高岗上，两手高高横举着枪，象是投降的样子，等到绿营兵走到岗下，他忽然拎起枪托，狠狠砸下去，他打惯油车，力大眼准，把个绿营兵砸得脑浆直流，他自己当然也被杀了。

“我在和村听见枪声后，原已召集队伍出去接应，但走到洪塘边，只见大队绿营兵沿大路进源里来，正在追赶四散奔逃的人。我知道事情坏了，只得下令大家回身向后撤，这一来，军心大乱，溃不成队了。我料定官兵一定要先抓我，在源里难以存身。因此我在横坑过桥翻过新岭，转到兰堰住了一夜。原想从那里去马涧的，走到中途，听说马涧也出了事，只得转回。这时进退两难，后来经过白下叶村到河山村附近山里，在一座人迹罕到

的大石佛寺里住了几天。

“消息不通，身边亦只有一两块银洋，既不敢回家，又无处可去。后来想起卖布佬说过寿昌也有我们的人，于是决定到寿昌去找找线索看。在寿昌乡下打听了几天，什么也没有找到。只是听说‘徐汝根聚众抗粮，已被官兵杀死。’于是我放心了，官兵不会来抓我了，决定还是回马目。

“我从白沙搭便船下来，一路上我头戴大箬帽，没有人发现我，上船后，我说头疼，用围身布包头，船上人也没有发现我。船到了下涯埠停靠时，自己一时疏忽，上岸解溲时忘戴大箬帽，旁边正好泊着县里‘二爷’（按：同知）的官船，差役见我回舱转身，脑后没有辫子，跳过船来，一把将我扭住送到官船上，捆绑进城，这是辛亥年九月初的事（按：八月十九夜，武昌已经起义了）。

“到了县里，县官升堂审问，他问我姓名，我想反正是死定了，倒不愿吃刑罚，就说：‘我就是你们“杀死”的徐汝根！’他问我有多少人，我说有好几万；又问我手下有那些头领，我报了一大串的假名字，说冲散了，他们到那里去，我也不知道，反正山坞里全是我们的人。——后来大家叫我‘百屁’（意思是说大话），就是从这里出名的。县官说是案情重大，也没对我动刑，将我钉上四十斤重的镣铐，打入死牢，待申报巡抚大人转奏朝廷再行‘大辟’。那时浙江的巡抚叫‘蒸瘟板’（按：增韞），原说要把我提解到省城去审问。不知怎的，几天后他们先开了我的镣铐，到九月廿九日，把我放了。

“我出牢后，从你家门前走过，碰到你的爷爷，才听你爷爷说省城早已光复了！（按：杭州光复是九月十五日凌晨）。

“事后想想，我当时又一个失策，是不该到马涧去，应当进源里到余家村。因为绿营兵追到和村就停兵不进了，午饭以后，连在埠头的协台，也都匆匆忙忙回城了，只是在埠头留下二、三十个洋炮兵，但驻不了几天也都回城了（按：对照历史记载，武昌起义前后，浙江巡抚增韞急调各路营兵去防守省城），所以他们也没敢进源里来搜村搜山。要是我不离源里，把大家再聚集拢来，先占领府城，要比杭州早举义旗，因为后来知道府城里已没有什么兵了。我们只要吆喝一声‘不交皇粮’，那怕大家不跟我们走？

“民国三年，又遭大旱，钱粮仍旧很重，村里的人又推我进城递送‘禀帖’，要求减免钱粮，我见到了县知事，这次可没有打我屁股，县知事对我笑笑说：‘你在前清当过土匪，造过反，还是本份一些吧。回去！’我们当年造反，原想‘恢复中华’，那知中华民国成立后，仍然落了一个‘土匪’的名声，心里真是无限懊丧！再看看光复以后的世界，照旧乱糟糟，仔细想想，还不如身背弯刀柴冲，终我的天年算了。”

西湖博览会纪事

张 任 天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在杭州西子湖畔举行的西湖博览会，在当时是盛况空前的，有人说，它曾哄动了半个中国（指东南各省）。

西湖博览会原定一九二九年三月间开幕，后来因为筹备时间来不及，展期到六月六日开幕，至十月十日闭幕，时间是四个月，每天开放时间从上午八时至下午八时。

筹 设 动 机

西湖博览会的举办，自然是为了提倡国货，劝工兴商，通过观摩和比较，促进产物的改良，达到实业的发展。这是西湖博览会开办的唯一理由。

考查世界上博览会的创设，自一七九八年法国拿破伦开始，此后其他各国群起仿行，而且格外别出心裁创立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新花样，使博览会更为丰富多彩，汇为大观。

我国最早的一次博览会，是在前清末年，在江苏南京所开的“南洋劝业会”。当时两江总督端方，为了举办“南洋劝业会”，化费了很多心血，也亏空了不少公帑。

举办西湖博览会的时代背景，正值国民党在北伐以后，通过一九二七年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大屠杀，把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镇压下去；同时军阀混战，连年战火不熄，至此，略为平静了些，奄奄一息的工商业也出现了复苏现象。当时浙江省政府主席是张静江，他是“四·一二”大屠杀在浙江的罪魁，声名极为狼藉，为了收拾人心，粉饰太平，便动了举办博览会的脑筋。张静江是湖州南浔镇人，是所谓“湖州帮”的财阀的头头之一，又是国民党右派的元老。北伐以后，国民党勾结了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时，也要拉拢民族资产阶级，使它也听命于国民党反动派，这也是举办博览会的动机。

此外，举办西湖博览会，名义上是提倡国货，事实上还有一个“隐衷”。因为这两年来张静江在浙江的挥霍浪费，使省财政已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想利用西湖博览会来扭转浙江省财政的逆势。

博览会的地点选定设在西湖，名称也冠以西湖二字。当然也是借重西湖的盛名以广招徕。当年西湖博览会的缘起中有一段话：

“西湖为天下名胜，凡游览西湖者，莫不顿起爱慕之心，此次博览会，藉以征集全国著名物产陈列，供国人研究比较，復冠以西湖名称，并即在西湖开会，是欲使天下人移爱慕西湖之心以爱慕国产，则国产之发达，正未可限量。”

组 织 机 构

甲、筹备委员会

西湖博览会在开会以前，成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从事筹备博览会的一切工作。这个筹备委员会是在民国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年）十一月里成立的，所有筹备委员会的委员，由省政府聘任并以建设厅厅长为当然委员兼主席，主席综理筹备委员会一切事务。当时浙江省建设厅厅长程振钧，字骏甫，安徽人，曾任北大教授，西湖博览会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里筹备开始，到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结束，而且结束以后很多的未了事宜，都是程振钧一人负责的。

但程振钧却受制于张静江。还有一段故事说明了这一点：西湖博览会组织庞大，所用的人员众多，办事人员从省府各厅处以及市政府调用以外，各大学学校的在校学生以及大工厂里的职工，都在调用之列。因为办事人员是临时拼凑起来的，真所谓五方共处，你管不了我，我管不了你。等到展览四个月以后，展览会发现很多陈列的物品不翼而飞，甲馆发现了这件事以后，乙馆从而效尤，结果八馆二所或多或少均发现缺少展览物品的情况，办事人员则互相推诿。当时程振钧主张彻查，务求得到一个水落石出。而张静江则主张“宽大”，在张静江的压力下，程振钧也没有办法，结果这件缺少展览物品的盗窃案，以不了了之。

这个筹备委员会下面分设总务、征集、场务三股，每股分股办事。总务股掌理关于职员任用、经费的收支、预算决算的编制等事宜；征集股掌理关于博览会出品的调查、征集及保管、运输、免税、车船减费交涉等事项；场务股掌理关于博览会会场的选择、布置，及出品的陈列、装饰等事项。

西湖博览会筹备委员会，为了便利征集出品起见，可以在各省市县镇设立分会，定名为西湖博览会筹备委员会分会。

当时浙江的所谓工业，不过是杭州的丝绸、湖州的毛笔、宁波的草席、绍兴的老酒、东阳的木雕、青田的石刻等，大多数不脱离手工业的范畴；所谓矿产，不过是长兴的煤、平阳的明矾、武义的碓石等，并不很多。为了充实西湖博览会展出产品的内容，一定得向其他各省市征集，以期完善。例如：上海市的各种机械，以及化学药品等；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安徽宣城的纸；徽州的墨；福州的漆器；山东淄博的料器；江苏宜兴的紫砂瓷等等，这类东西是举不胜举的。要在本省以外的其他各省市征集展览物品，不能不在各产品所在地设立筹备委员会分会了。

乙、西湖博览会

筹备委员会仅仅是在筹备期间的临时机构，当筹备事项结束了以后，西湖博览会才是正式的机构。

西湖博览会的组织是相当庞大，这和当时省政府主席张静江好大喜功，手头阔绰是分不开的。它的组织和人员录之如下：

西湖博览会设会长一人，综理全会事务，由省政府主席兼任；副会长一人，由建设厅厅长兼任，辅助会长办理会务。

西湖博览会内部又设评议部和执行部两部。

评议部置委员若干人，评议委员是由会长聘任的，评议委员除了一部分是建设厅的各类技术人员以外，另外聘请大学里的校长、教授，以及各大工厂的厂长和技术员。西湖博览会还规定各地区、各厂参加展览的产品得发给奖状，以资鼓励。奖状计分为：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等四种。各厂的厂长和老板为了使本厂的产品获得较高的奖状以为将来推销产品的基础，所以不惜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段联络评议委员。评议部的开会，往往你争我吵，不欢而散。